


共产国际·斯大林 与中国革命

〔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原著

廖东王宁编译



求实出版社

共产国际、斯大林 与中国革命

(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原著
廖东、王宁编译

求实出版社

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

费尔南多·克劳丁原著

廖东、王宁编译

求实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 5.5印张 106千字

1982年3月第一版 1982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700册

书号：3231·36 定价：0.56元

内部发行·

译者前言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在论述毛泽东思想时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

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这是极其深刻的总结，含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给广大读者提供一点学习辅助材料，我们特地编译了《共产国际、斯大林和中国革命》这本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是从《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一书摘编翻译的，依据的是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一九七五年英译本，英译者为布莱恩·皮尔斯和费朗西斯·麦克多那。此书为长达三大卷、字数逾百万的巨著，第一卷上、下两册一九七〇年在西班牙出版，另外还出版了法文译本。此书作者费尔南多·克劳丁原为西班牙共产党党员，一九三七年当选为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一九四七年起任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直至一九六五年被开除出党；当时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因为他对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持批评态度，就指责他是“从右的方面反对党”。此后，他一直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从事有关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工作。附带提一下，克劳丁对“欧洲共产主义”也是持批评态度的。

克劳丁的这部著作列举了德国、意大利、西班牙

牙、法国、南斯拉夫和中国的革命历史及现状，试图总结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这本小册子主要是摘编翻译它的关于中国部分。

《共产国际、苏联与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失败》，系译自它的第一部分《共产国际的危机》第四章《政策危机》中的《中国革命》一节。文中对共产国际、苏共、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右的和“左”的错误的批评，总的来说有正确的一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对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抵制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错误干预，给予高度的赞扬，是完全正确的；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维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态度提出批评意见（见注释17），也不无可供参考之处。但克劳丁的不足之处和缺点错误的方面是在于：（一）只讲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而没有讲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功绩，特别是共产国际初期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纲领的制订，帮助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和援助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对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的影响和帮助，苏联对中国抗日的援助，共产国际解散后的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消灭关东军，使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

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初期对我国一百五十六项建设项目的援助等等。不指出这些，就是不全面的。（二）克劳丁采取同情陈独秀的态度，把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都推给共产国际和苏联，也是不对的。共产国际、苏联以及它们在中国的代表，当时诚然都犯了右倾错误，但是这并不能否定陈独秀自己犯右倾错误的主要责任。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对形势的错误分析诚然是从共产国际来的，但攻打大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主义行动计划是属于李立三自己的，这不能推给共产国际。（三）克劳丁因为中国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就否认它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作用，似乎中国革命的本质就在于它是农民革命和争取国家的完全独立，这更是不对的。其实，作者也承认，没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不使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的轨道发展，中国革命是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的。不过，克劳丁的这段论述虽然有上述缺点，但仍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斯大林与革命胜利前后的中国》，系译自这部著作第二部分《斯大林主义的顶峰》第八章《东方的崛起》。文中就斯大林与革命胜利前后的中国这个问题作了广泛的探讨和深入的分析，并提供了相当

丰富的资料。克劳丁的不正确之处是，不承认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同时，把延安整风运动称为个人崇拜的开始也是不对的。整风运动是结合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进行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设具有重大作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克劳丁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和预测：“在革命活动中，‘西方’的领导作用已经被‘东方’所取代。没有理由预言这是领导作用的最后改变。相反，在理论和实践水平上，有一些模糊的迹象好象指出，西方无产阶级可能再次在历史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这种既是脑力劳动者又是体力劳动者的无产阶级，与马克思、列宁所熟悉的无产阶级是非常不同的。我们也不应忘记，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样是‘新型的’）无产阶级，也将要求有发言权。世界革命的进程还会有许多使人吃惊的发展，还会有许多人物的变迁。”克劳丁的这个预言当然未必正确，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了解这部著作的概貌，这本小册子还译载了该书的目录、序言和结束语。克劳丁在第一卷结束语中指出，斯大林的逝世开始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而危机的根源在于苏联在

斯大林领导时期就出现了新的特权阶层，这个阶层要求国际共运服从于苏联一国（其实是服从苏联特权阶层）的利益，从而背弃了世界革命。这个危机还来源于列宁的建党学说。克劳丁的这个论点，不论其正确与否，姑且作为一家之言，⁹⁸仅供大家思索与探讨的参考。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了解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这个主题，我们还将这方面的重要史实和言论多方加以集纳，以译者注的形式加在原注之后，以供查阅参考。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和附加文字定有不当以至谬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指正。本书的附加文字由田为本同志执笔。

一九八一年七月七日

目 录

| | |
|-------------------------------------|-----|
| 译者前言 | 1 |
| 一、共产国际、苏联与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失败 | 1 |
| 二、斯大林与革命胜利前后的中国 | 28 |
| (一)中国革命与“盟国” | 31 |
| (二)革命战争还是“民族团结” | 38 |
| (三)中国的“铁托主义”怪物 | 44 |
| (四)中苏同盟 | 50 |
| 附：《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 |
| 一书目录、序言、结束语 | 59 |
| (一)目录 | 59 |
| (二)法文版的说明 | 62 |
| (三)英文版的说明 | 63 |
| (四)乔治·森帕兰的序 | 64 |
| (五)引言 | 71 |
| (六)结束语 | 75 |
| 注释 | 132 |

一、共产国际、苏联与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失败

中国革命于一九二七年初的几个月进入了紧要关头。国民党的军队在蒋介石的统率下自一九二六年夏开始“北伐”，其目的是实现中国的统一和独立，把孙中山的共和政体推向全中国。一九二三——二四年后，孙中山在广州一带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由于苏联援助，他创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¹ 共和军（指国民革命军，下同——译者）进展迅速，一九二六年底，国民党政府迁入扬子江畔的武汉，其管辖地区已扩展到中国南部和中部地区大约十个省份。南京、上海于一九二七年三月攻克。随着共和军的向前推进，工农群众也行动起来了。罢工、起义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进展而发生，有些甚至在军队到达之前就发生，并帮助了军队的进展。在上海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在蒋的部队到达之前，共产党和工会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就控制了这座城市。这一工农群众运动的规模之大，特点之鲜明——在某些地区农民的团体进行了他们自己的革命：土地革命——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感到惊恐。后者立即对它们在中国领土上的基地即声名狼藉的“租界”增派部队；上海的

银行家和买办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下组织了一场反革命。

直至今时，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盟友，或者说，是国民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党员也是孙中山建立的党的党员。他们也分享了一些领导权，虽然他们只占少数。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是有能力将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进行到底的组织。它给国民党所下的定义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一九二六年三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把国民党作为“同情党”接纳为共产国际的成员，蒋介石并成为其主席团的“名誉委员”。一年之后，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和七月之间，蒋介石就向共产党进攻并竭尽全力摧毁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的部队和上海资产阶级组织的武装流氓一道突然袭击了那个城市的共产党和工会组织。几天之内，成千名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包括共产党和工会的杰出领导人，被野蛮杀害或投入监狱。共产国际的领导认为“蒋介石的政变”是“民族资产阶级”即国民党“右派”转向了反革命，而它的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仍留在革命营垒之中。武汉政府是这个左派控制的。按照共产国际的分析，“左派”在“四个阶级的联盟”中占了百分之九十，因而是真正的国民党。起初，“左派”的确也谴责了蒋的政变，于是国民党在政治上、武装部队和占据的地区上分裂了。武汉政府和继续效忠于它的军队控制着内地的省份。而在南京成立了自己的政府的蒋介石控制着沿海的省份，

并把他在上海制造的对共产党和工农组织的恐怖扩大到在他管辖下的全部地区。按共产国际的说法，武汉成了“革命的中心”，两名共产党人在那里参加了国民党的政府。但是，尽管共产党作出了试图加以节制的努力，土地革命还是在武汉控制的区域发展成为日益增长的威胁。七月十五日，在蒋叛变的三个月之后，“左派”国民党采取了与“右派”相同的态度，从党内和军内清除了共产党人，并杀害和关押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的革命斗士。几个月之后，“右派”和“左派”言归于好，蒋成了公认的国民党最高领袖。共产党被大批屠杀，被破坏，并与工会、农会一起被宣布为非法。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人组织了一系列孤注一掷的反击，试图挽回局势。其中一次是有名的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公社起义。这些反击都被镇压下去了，到一九二八年初对中国共产党的血腥毁灭已成为完成了的现实。

在蒋的政变之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马上开始了讨论，随着事态的发展，讨论持续进行，经过了几个阶段，直至一九二八年夏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为止。但是，在讨论中不同路线的人在一个重要观点上看法是一致的，这个观点在中国党对自己的党史的不同论述中得到了重申，并且也见之于苏联历史学家和西方作者有关中共党史的著述，这就是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人遭受的灾难性挫折并非某些特定的力量对比关系的不可避免的结局，而首先是共产党领导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后来的事态发展在实际上证实了这个观

点。在镇压下死里逃生的一批批共产党人把他们的活动中心转向农村，很快就成功地组织了几个革命根据地，在那里领导机关成立起来了，武装部队也建立了，这些在此后几年发展到了相当规模。这揭示了一条事后的真理：与导致失败的策略不同的策略本来是可能奏效的。即使是在全中国范围取得革命胜利的客观条件尚不具备，如果共产党预见到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叛变”（其征兆在此前的一年中不断增加），而不至于在反革命政变时措手不及的话，大失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本来可以在对工农更有利的基础上进行。² 在一九二七——二八年进行的分析是不能考虑到后来对这一点的证实的，但对当时这种势力及其能量的研究使它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失败不是客观条件的必然结果，而是政治错误的必然结果。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问题是给这些错误定性并追究其责任。

在一年的讨论之后，布哈林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用以下的话归纳了共产国际领导的看法：

“这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革命一些主要的问题。如大家所知，中国共产党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是事实。问题是，这个失败是否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奉行的错误策略所造成的后果？也许加入一个同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的确是不明智的；也许这是原罪，是根本的错误，这决定了其他错误，并逐渐地、一步步地导致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

布哈林这样回答了他自己提出的问题：

“总而言之，并非策略的主要路线有错误，有错误的是政治行动和对这条在中国的路线的实际运用。首先，在中国革命开始时，在与国民党合作的阶段，我们的错误是对国民党批评得不够。应当是作为同盟者，但我们的党有时成为国民党的附庸。其次，中国共产党未能理解客观形势的变化，未能理解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变。因而，在有的时候与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前进是可能的，但到了发展的一定阶段预见到即将来临的变化是必需的……第三，我们的党有时当了群众运动的刹车器，当了土地革命的刹车器，当了工人运动的刹车器。这些是致命的错误，自然它们帮助造成了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在所有这一系列失败之后党开始努力去坚决地纠正它的机会主义错误。但这时，如时常发生的那样，一些同志跑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没有足够小心地为起义作准备，他们表现出极明显的盲动主义倾向和最坏的一种冒险主义。”³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对导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的失败的政治错误的极好总结——如果我们再加上两条基本的更正的话。这两条更正是：（一）所犯的错误不仅是在中国共产党“对路线的实际运用”的水平上，它们源出于共产国际领导采取的“主要的策略路线”；（二）在布哈林谈到“中国共产党”时，都应当读作“共产国际领导”或“执行来自莫斯科的路线和指示的中国共产党”。

第二条更正的理由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最高中心的那种关系（与后者同其他任何一国支部的关系一样）来

看，多多少少是不言自明的。这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期间是特别明显的，当时苏联政府直接干预了中国的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斯大林的监督下，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可避免地不仅要决定“主要的策略路线”，而且要密切地核查这条路线在实践中的应用。最近二十年来通过论述中国革命的大量历史和政治著作而公诸于世的事实使我们可以设想，在这个阶段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对中国党行使了与其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对西班牙共产党所行使的非常相似的“监护权”。⁴ 把责任推到中国党的领导，特别是其总书记陈独秀身上在共产国际来说只不过是履行了已成惯例的公事而已。托洛茨基在他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的著作中卓越地表明，布哈林所列举的错误并不简单地是“应用”上的错误，而且是由“主要的策略路线”而来的。在这两个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性质和由谁为这些错误负责——在这里只能简要地提到一些最突出的事实。

国民党和共产党结成联盟的形式和内容都不是这两党之间讨论和决定的。这些是孙中山和共产国际代表，更特别地说是和苏联政府代表直接讨论的结果。为中国共产党制订了路线的文件是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孙中山和苏联使节越飞发表的宣言。宣言称“共产组织，甚至苏菲(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共同目标必须是“统一与国家的独立”。

苏联代表和孙中山的代表之间的谈判也决定了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形式。孙反对一个作为两党之间的联

盟，他只同意共产党人个人成为国民党员，而他们必须受国民党的纪律制约。起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拒绝了这种安排，争辩说这将意味着用党的政治独立作抵押并在群众中造成混乱。但是，最终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他们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六月）同意加入国民党，虽然并不是没有受到激烈反对。大会遵从了共产国际制订的路线，在宣言中说，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⁵毋庸指出在此种条件下达成协议的这个联盟与共产国际第二和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论点背道而驰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显而易见，孙文一越飞宣言没有表明在理论上断定了中国经济对“共产主义制度”来说是不成熟的，而宣布“苏维埃制度”也不适于中国，这一事实是非常重要的。难道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其他一些场合没有说过苏维埃制度对东方农业国是完全适合的吗？宣言是政治上的妥协，苏联领导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从而向孙中山保证，他们不会试图给国民革命里增加社会革命的内容。这个保证特别与土地革命有关，土地革命的幽灵一直缠绕着国民党资产阶级。⁶而且，把中国共产党人置于国民党的纪律约束之下证明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更不相符合的，而同时国民党——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从一九二四年以后已改造成为结构与布尔什维克党相似的集中制的党。简而言之，“主要的策略路线”的实质在一九二三年以后存在于对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